

歷史與空間

馬承鈞

列子故里的書院文化

立秋當日，筆者走進鄭州航海東路花木蔥蘢的「專家公寓」小區，登上一幢複式樓宇，頓時雙眸一亮：窗明几淨的廳堂清淨雅致，一幅古賢畫像懸掛牆上，櫥窗擺滿各種經史子集，「列子教育」四個褐色隸書凸顯古風——這裡便是新成立的鄭州列子書院。

年富力強的吳建增院長迎上前來，他開門見山道，書院是中國特有教育形式，始創於唐、興盛於宋、完善於明。公元724年，唐玄宗在洛陽建的「麗正書院」是最早的官辦書院，主要任務是搜書、校書、藏書。爾後各類民間書院雨後春筍般興起。「歷史上我國有書院7,000多所，咱河南就有2,000多所，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河南就佔兩所——即商丘的應天書院和登封的嵩陽書院，書院文化的根就在河南。」

「你怎麼想起創辦列子書院的？」我問吳院長。「列子是鄭州一張閃光的名片，作為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道家領袖，他對華夏文化功不可沒，其作品萬世流芳。」吳說：「在文化強市、文化強國的今天，傳承弘揚列子文化的意義不言而喻，有鑒於此，我與一幫列子文化傳人經過反覆探討論證，發起並經上級審批核准，成立了鄭州列子書院。」

我見廳堂中央掛有一面投影屏幕，兩旁楹聯曰「列子揚道傳承文脈，奠基教育塑能創才」，右邊還掛有近期的教程提綱：「心境篇、喚靈篇、養性篇、壓控篇、幻形篇、馭情篇、塑能篇、易生篇、力命篇、續水篇和廢心用形、能量三層、死復活用、性能互動、道在永恒」……他們的國學造詣和苦心孤詣令我感佩！

聽說現在每周安排兩個半天課程，我問：「聽課者是哪些人？」

「都是列子文化追崇者，有機關幹部、大學生、中小學教師和公司白領。」授課老師劉人夫說：「我們並未對外宣傳，慕名而來者還是不少，目前正逢暑假，來聽課的大學生和國學愛好者更多了，只好臨時增加課時……」

我又問：「列子書院教學方向是什麼？」

「我們的初衷是響應國家經典誦讀工程，將國學物化為一種喜聞樂見的生活形態，通過物化分享、領悟國學經典的內涵與魅力。」吳院長說：「書院除講授列子文化外，還開設『道文化』和讀經、養生、書畫、禮儀、茶藝、琴藝等傳統教程，也選讀一些西方經典、天文地理和現代科學，讓學生在經典的潛移默化中提升品性修養，養成沉穩、厚重、大氣、包容的文化氣質。」

吳披露，他們已在列子故里大孫莊的列子國學幼兒園後院建起一爿花園，修建了書齋、課堂和宿舍，書院不久將搬過去正式對外招生，第一期30名學員，學制九年。注重智能的開發、人格的培養和生命內涵的提升，讓學子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聽了吳建增介紹，令我等對鄭州列子書院充滿期待。

我想起，中國最早的民辦學院是唐朝末年九江東佳書院，由江南望族陳氏始祖陳旺創辦，由一間私塾逐漸發展成規模書院。史料說「院閣九幢，約30間。亭台樓閣，聳延四方，棟宇連雲，旌旗映日」，有「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之譽。北宋學者錢若水賦詩點讚：「樓上落霞粘筆硯，池邊怪石間松筠，朱實垂庭紅橘熟，清香襲座藥畦香。」

吳建增點頭曰：「以自學為主、注重啟發誘導是書院一大特色，歷史上書院作為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培養出不少俊傑。如明代無錫的東林書院，就培養出楊漣、左光斗等一批不畏權勢、匡扶正義的進步人士，被譽為『東林黨』……」



筆者造訪過宋代「文人官員」范仲淹在河南鄧州建的花洲書院。院內有講學堂、藏書樓和齋舍等，還建有覽秀亭、春風閣，曰百花洲，花洲書院由此得名。范仲淹深知教育人的重要，工餘常親自到書院講學，使鄧州文運大振，培養出張載、韓維、范純仁等一批名士。范公還應摯友滕子京之邀，在花洲書院寫出千古名篇《岳陽樓記》，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絕唱。

薪火相傳，文脈不斷，正是古代書院優秀傳統催生了現代書院的興起。吳院長介紹，1984年由著名學者馮友蘭和張岱年、湯一介等人發起，聯合內地多家著名大學和港台及海外多位著名專家創建的以研究、繼承和闡揚優秀文化遺產為宗旨的中國文化書院，是新中國第一家影響深遠的頂級書院，導師包括季羨林、侯仁之等名家。2006年在北京香山創辦的四海孔子書院是首都首家以孔子命名的民間書院，它參照宋明書院模式，遵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理念，以諸子經學為核心，兼修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面向4歲至10歲的海內外孩子招生，也反響不俗。

劉人夫說：「旅美華人在美國興辦的美洲孔子書院，以祀奉孔子、弘揚國學為己任，也反響不俗，台灣學者伏嘉謨為其撰聯云：『至聖孰能名由義居仁一脈儒風揚彼美，華僑尤愛國熟詩樂禮千秋書院起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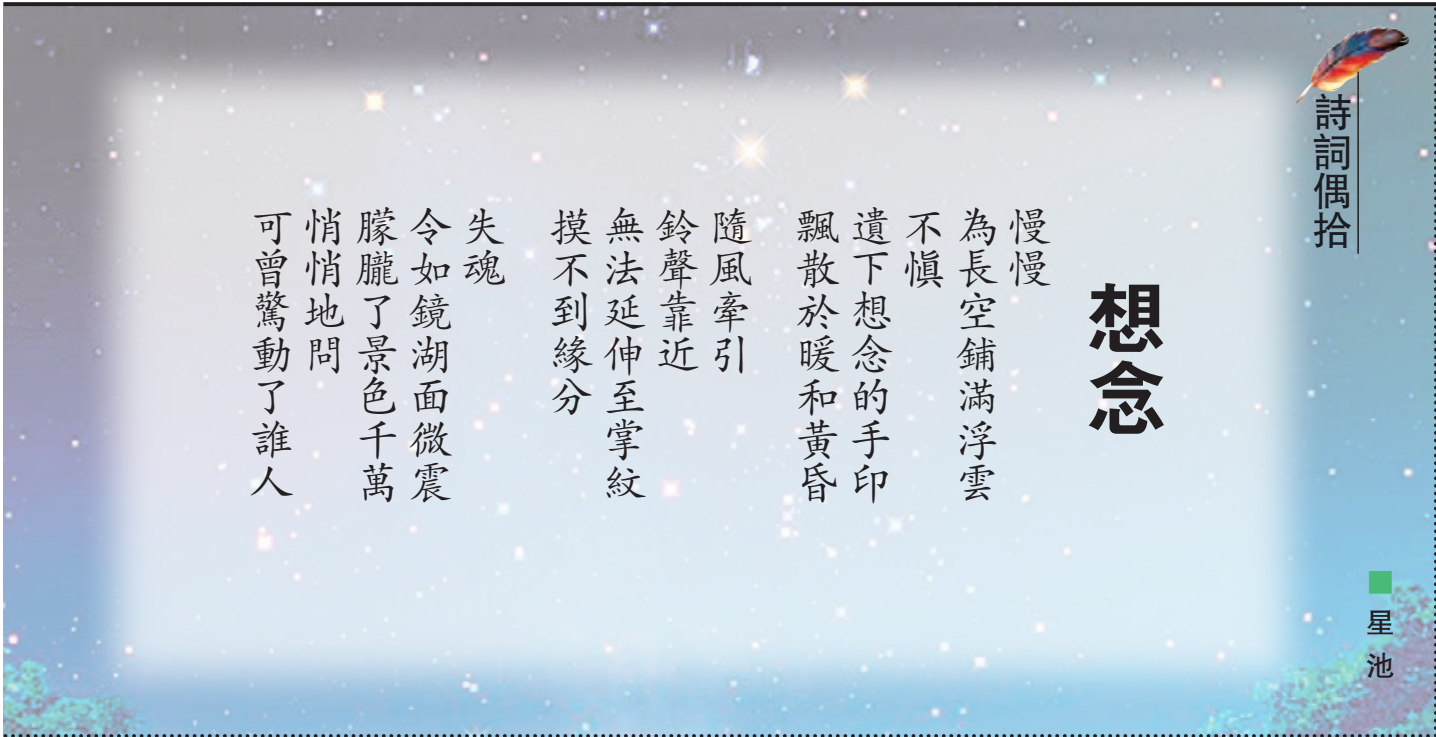
我想起：受明代大儒王陽明影響的學者蔣慶，2001年在貴陽修文縣龍場鎮創辦的「陽明精舍」，依山傍水，有五個院落，被譽為「最復古的現代書院」。今年6月，「紫禁書院」在深圳鹽田正式掛牌，著名學者、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和鳳凰衛視主播王魯湘等出席揭牌儀式。吳建增道：「紫禁城在國人心中獨享尊榮，紫禁書院在『改革開放橋頭堡』深圳登場，堪稱古典與現代聯姻，彰顯出吐故納新的文化自覺！」

「確實，我們今天很需要找回那些淡忘的優秀文化傳統！」我感嘆：出現現代書院是一種社會進步，凸顯了開放多元、寬鬆自由的社會文化生態。毋寧說它是在長期形成的鐵板一塊的教育體制上，撕開一個小小口子，闢出一條新的路子，給國人提供了另一種受教育機會，我相信列子書院將不負眾望！

吳建增朗聲道：「河南是古代書院發祥地，邁上這條傳承與創新的融合之路，有列子精神感召，我們一定成功！」

在當下人人看重物質的快節奏E時代，人們究竟為何而活？眾生期盼什麼？人生的價值又何在？古賢為我們作出楷模——孔子周遊列國14年，帶出弟子3,000人、72賢人，晚年修訂六經，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列子隱居鄭地40載，生活潦倒而不忘初心，一生求真修道，撰下八卷百餘篇精妙佳作，成為世界級哲學大家和寓言大師……這些國學經典在普通學校難以面面俱到系統研學，孔子書院、列子書院正好補闕掛漏，不失為一件大好事、新創舉！與吳院長握別，我送他四句詩：

多元社會起新潮，
文化傳承春色耀。
列子書院應時立，
聖賢誨人步步高！



來鴻

這渡口真美，彷彿夢中見過。

青青的山，竹樹蔥蘢；盈盈的水，清波漣漪。山是四明山，水是姚江水，山下水邊有渡口，這渡口叫做河姆渡。河姆者誰？該是河之母、河之神、河之精靈吧。

七千年前，沒有可以記載的文字語言，肯定沒有「河姆渡」這個稱謂，但這一片膏腴的土地有母、有神、有精靈，他們是廣袤江南的主宰，是我們的老祖宗。

洪荒荊莽，群獸出沒，只有萬物之尊的人類才能戰勝一切，征服一切，頑強地生存下來，進化發展下去。這生存、進化和發展就是不斷文化的過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河姆渡文化是那樣的洋洋灑灑、驚世駭俗！

渡口老樹上的蟬鳴一聲緊似一聲，遠古時代也有蟬鳴嗎？肯定有的。蟬鳴依舊，整整鳴啼了七千年啊，送走了炎夏，迎來了清秋，瘡痍了，墜地了，死去了，新一代蟬破土了，上樹了，放歌了，十七年的蟄伏只為一個夏秋鳴放，死而無憾。蟬啊，你可知這一片神奇土地上的先民為了生存發展經歷了幾多艱辛磨難？一年年，一代代，生生世世，那又何止十七年的痛苦蛻變？蟬的蛻變終究是吸風飲露的蟬，人的發展從茹毛飲血一直到上天入地無所不能！

渡口往返着一艘鐵殼的擺渡船，木櫓、櫓臂，櫓鼻在櫓臂中輕輕轉動，櫓聲欸乃，船在清盈盈的姚江水裡徐徐而行，古風依稀當年。是的，這裡不能建橋，有橋便無渡，「河姆渡」這個環宇有名的稱呼就失去了實際的意義。

七千年前就存在的渡口，有出土的木槳為證。有槳便有其船，船和槳是我們的祖宗開發大自然的重大進步，這是「衣、食、住、行」中「行」的革新，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干欄」式房舍

的椿子和葦席，那便是「住」的突破了。從前但知祖先的樹上結巢、洞中作窩而居，殊不知江南的河姆渡人七千年前就有了跟現在湘西雲南「吊腳樓」相仿的「干欄」式房屋了，房草和葦席散出的清香與陶釜中發出的烹肉煮飯的香霧氤氳於這樣的房屋之中，先民遂得以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站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前，看着那華美精緻的建築，你在讚嘆人類偉大創造之餘，不能不感慨這種創造的艱辛和漫長，從河姆渡房屋的雛形「干欄」式發展到如今的華屋大廈畢竟花了七千個春秋啊。「衣」和「食」的進化同樣如此，這裡出土的骨針和線錘得以紡紗和縫紉，於是先民有了蔽體的衣服，擺脫了裸形的蒙昧，某種意義而言也遏止並最終結束了兩性的混亂，體現了作為人類的尊嚴，保證了種族健康的繁衍；這裡出土的稻穀和骨耜說明了水稻栽培的發端，先民以稻米為主食，以狩獵成果為副食跟今人的食物結構已經一致，換一個說法，我們今天的食物結構極可能在七千年前已經由祖先作了實驗和規範，這是一種合理的食物結構，於人類的生存相宜。

河姆渡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還在於我們的先人在「豐衣足食」之餘竟然有了藝術的創造，當國寶級文物「雙鳥朝陽」象牙雕展現我們面前，我們不能不嘆為觀止。那烈焰熊熊的太陽，那栩栩如生的雙鳥便是放到今天也不失藝術的品位。除此，還有陶塑和陶刻的豬，還有骨哨……這些都是新石器時代傑出的創造，足以炳彪中華史冊，要不何以自1973年河姆渡遺址發現之後，中國的歷史書上不得不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河姆渡，這個無名的古渡口從此名播四海。

這渡口真美，真神，真偉大，彷彿夢中見過，比夢中所見更令人心馳神往……

古典瞬間

龔敏迪

「作家」如何成了貶義詞

偶然見有個叫《原來是這樣》的節目說，「作家」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根據之一是《晉書·食貨志》說：「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積蓄。」這個「作家」明顯不是那個「作家」。晉習鑿齒《襄陽記》說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楊）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二者說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和《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說的：「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卻來這裡打秋風！」一樣。「不能作家」，是不會過日子的意思；而楊顥的比方是說諸葛亮管得太多了，日常居家，家長尚且不能什麼都自己去做。

說「作家」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的根據之二是，《太平廣記》載：「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酬金）者，誤叩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王維是鄰居，王璵多為別人寫墓誌碑文。那時候寫墓誌很能掙錢，尤其是名人、高官的手筆，所以求他寫墓誌的趨之若鶩。論名氣王維不下於王璵，但他不屑於王璵那樣的為掙兩錢而作「諛墓」文，所以很看不起王璵。不過「大作」，似乎是相對於工匠的「小作」而言的。《逸周書》說：「汝無以小謀敗大作。」孔晁註釋說：「大作，大事也。」孔穎達也說：「大作，謂興作大事也。」當時很多人正是以墓誌為大事的。所以「大作家」不是指幫人辦大事的人家，所以他才指示說：「在那邊。」當時還沒有稱文人為作家的。

作，有創作、勞作之別。東漢的王充說：「《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典》、班叔皮《傳》，可謂述矣。」他說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劉向的《新序》、班彪的《史記後傳》，都不是「作」，只是「述」。連孔子都說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王充解釋說：「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前所未有的發明創造，像倉頡作書，伏羲作卦那樣，才是「作」。沒有原創，只是把前人傳下來的東西經過整理來說事，只是「述」，不得為「作」。《資治通鑑》說戰國時，「魏安厘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

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魯仲連在安厘王眼中是獨特而不可理解的人，而子順卻說誰都想有個性，但只有在德行上堅持不懈的人才能成與眾不同的君子，而魯仲連的特立獨行已經習慣成自然。

按照今天的說法，王充的《論衡》無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他自己卻說：「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因為不是造始更為，所以不敢稱作，也不敢稱述，只是編者而已。他繼續說：「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史就獄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史謂作乎？」硬要把自己的《論衡》稱為作，豈不是儒生、文史都想稱自己是作了嗎？「作者」、「作家」之稱，談何容易！

禪宗以大有機用者為作家，《碧巖錄》中有「趙州是作家」、「作家宗師」。比如他們有棒喝之法，參不透真諦者往往要挨師傅的棒打，可是《景德傳燈錄·普岸禪師》的故事，平常都是師傅打參拜者，這回卻是「僧侶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禪師挨了打，居然反而稱參拜者為「作家」，是因為對方已經參破佛性遍在的真諦，而且表達的方式出人意外。普岸禪師多處談到作家，有個叫義玄的禪師來訪，普岸禪師問他：「近離甚處？」聽說是從江西黃檗來。他就說：「情知你見作家來。」義玄禪師回答：「特來禮拜和尚。」普岸禪師也不客氣，說：「已相見了也。」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蘇東坡在《水六法像贊》中說：「是真作家，當獅子吼。」沒有一點振聾發聵的功力，是難以稱真作家的。

如今，「作家」一詞已經不同於古代，但凡發表過一些文章的人，往往被冠之「作家」的頭銜，謙虛一點的也為「作者」，這也無需苛責。但個性化的思想與藝術的堅持與突破，仍然是一個優秀作家的追求，只是寫些花拳繡腿的東西糊弄人，或者寫些老生常談的文字度日，既無思想，又不傳播什麼知識，還要稱「作家」，那麼「作家」恐怕就真的要成為貶義詞了。

字裡行間

黃仲鳴

吳昊籲挽救通俗文學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十二大卷終大功告成，連《導言集》也出版了。第二輯1950-1969據云正籌劃中，希望能快些開工，早日見其成。由是，我想起兩個人，一是陳萬雄，二是吳昊。陳萬雄任職藝發局時，早有編撰香港文學史之舉，惜班底組不成，計劃胎死腹中；當時陳青楓說，通俗一章最宜你寫，我說吳昊更為適合；如今若編選第二輯，涉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所藏的資料更為豐富，可惜斯人已逝，天不假年也。

一九九七年，吳昊曾在報章專欄呼籲挽救香港多姿多彩的通俗文學。他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壇光輝耀目，尤其是那些類型多元化的通俗小說，如偵探、武俠、間諜、江湖奇情等，高手輩出；至於通俗雜誌也同樣精彩，如《西點》、《黑白》、《天地》、《星島畫報》、《藍皮書》等，幾十種之多，雖然在當時只供人娛樂、消閒，但如今翻閱，卻能得見當時香港社會的生活、風情、人和事的變遷等，甚有歷史和文化價值。他慨嘆，可惜，過去的殖民地政府有意抹煞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毫不重視保留這些報紙雜誌，圖書館更沒收藏那些通俗小說。結果，當報館和出版社關閉，亦無資料館人員主動接觸挽救，令到此等文化遺產自地上消失。所以，他促請圖書館、學術機構從速收集作家的生平資料，整理作品，發起研究，急起補救。

談起作家稿費，吳昊嘆說甚為可悲。這，筆者亦有同感焉。他說，由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大約十多年個年頭，報紙都賣一毫子，傍晚拍拖報更一毫兩份，從不加價；而一般稿費也不見得怎樣增長，有十元一千字、八元一千字，甚至五元一千字的；年年通貨膨脹，稿費卻「巋然不動」，結果由早年可觀的報酬淪為後來可恥的收入，但文字市場供過於求，你唔寫有人排隊等住寫，我們的作家受盡折磨，有餓死者，有急流勇退改行者，有粗製濫寫者，結果破壞了文學創作。到七十年代初，香港文壇已潰不成軍，不是由一小撮分子獨霸報章雜誌地盤，就是有志者望而卻步。

吳昊欣慰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通俗文學大放異彩，武俠小說、偵探小說、奇情小說，甚至愛情小說大行其道時，連帶電影也受益不少，片商只要得見某某小說流行，就會購入版權，編拍成電影，什麼《仙鶴神針》、《黃毛怪人》、《黑俠》、《半下



齋公的黃飛鴻故事，被片商爭相取用，改拍成電影。 作者提供

流社會》、《經紀拉》等，換句話說，通俗文學豐富了電影題材。吳昊是研究電影的，通俗文學與電影的關係自然大為關注，可惜未得見這方面的大著。

我記得曾看了部《人海孤鴻》，是李小龍主演的，票是參加《青年樂園》填字遊戲得獎送的，但在此之前，我已看了歐陽天的原著了。司空明的都市小說如《九九九命案》、我是山人的洪熙官、齋公的黃飛鴻小說，都被改拍成電影。金庸、梁羽生作品也上了大銀幕。

當年的通俗小說，確為香港影壇「爭光」不少。